

文学圆桌

如父如子如秋风

关于《半个父亲在疼》

| 庞余亮 文 |

在这个世界上,穷人家的父亲,总比别人家的父亲多了一个急脾气;而穷人家的儿子,也比其他人家的孩子,多了一颗敏感心——比如风湿痛对于阴天的敏感,比如风泪眼对于秋风的敏感。

父亲母亲生了我们十个子女,最后活下来的是六人,我是第十人,也是第六人。在这样的家庭中,勉强填饱肚子的我们早就习惯了父亲的暴脾气。

暴脾气的人往往有高血压,1989年春天,父亲中风偏瘫在家,作为老儿子的我必须每天为他服务。父亲一辈子都是在村里的英雄,中风之后,他很不习惯自己被困在一半僵硬的身体中,脾气更加暴躁。在与他相处的最后五年时间里,我们父子失去了所有的耐心,父亲埋怨人,骂人,甚至用手中的拐杖打人,给他洗澡的时候,因为他的重心不稳和我的个子太小,而导致跌倒在地,父亲咒骂得更厉害,而我也慢慢习惯跟他对骂。1994年秋天,偏瘫五年的父亲去世了,在之后的七年中,我没为父亲写一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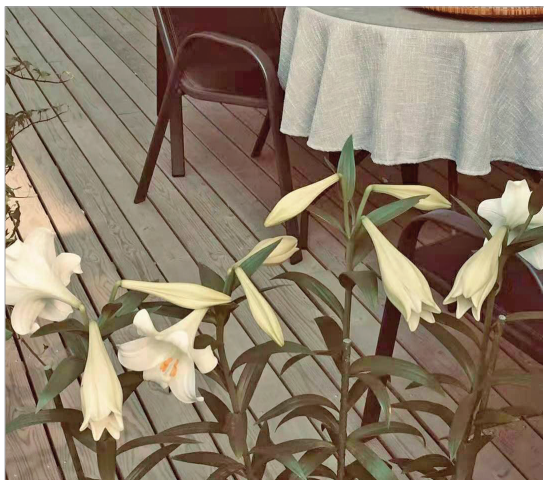
再后来,我从家乡来到长江边的小城谋生,也是一个秋天,我在小城的公园门口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中风老人,我走上前去,扶着老人在公园里走了一圈,老人身上的气息就是我父亲的气息,中风老人的气息其实是一样的啊!

那天晚上,我开始写《半个父亲在疼》,敲到“父亲”这个词的时候,键盘就卡住了,我顿时想到了天上的父亲,他不让我写,也不允许我写!后来才发现,不是天上的父亲,而是我敲打“父亲”这个词,在键盘上用力太过了!再后来,我写完了这篇等了7年之久的文字,全身的毛孔一一敞开,像一间空旷的旧房子,从江面上刮过来的秋风,就这样穿越了我: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

父亲不识字,母亲也不识字,偏偏我爱上了写诗。有次,我正在写诗,父亲突然问我在干什么,我想告诉他我在写诗,但如果解释“诗歌”——是无法解释的,后来我说,我这个东西写好了,可上报纸。上了报纸的话,可以换钱。他问我这个可换多少钱?那时候一首诗可拿到8块钱稿费,我说可以换8块钱。谁能想到呢,他竟然命令我说,你今天不要再干其他事了,就这样写!

父亲不知道,写作不是下命令。当父亲不再给我下命令的时候,我写出了散文《半个父亲在疼》。这本书是2018年8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分为《父亲在天上》《报母亲大人书》《绕泥操场一圈》《永记蔷薇花》四辑。此次承蒙我所热爱的九歌出版社看中,出版《半个父亲在疼》繁体字版,编辑建议我删去第三辑《绕泥操场一圈》,增加其他的内容,于是,编入了写父亲的4篇新散文,写母亲的7篇新散文。原来记录我成长的第四辑成了第三辑,这样,正好构成了“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人的完美结构。

衷心感谢苦心细致的编辑,能让我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在文字里再次相逢。通过书写我已慢慢理解了他们,也慢慢地理解了自己,我,这个穷人家的小儿子,因为有了九歌出版社的加持,同样得到了浩荡秋风的宽慰。



室内

摄影 草白

艺苑

传奇中的人身负绝技

——翟永明诗歌抚谈

| 杨斌华 文 |

“传奇中的人身负绝技/他拼命往前走/闪客们也纷纷让道/我愿他们的剑纷纷无力和断裂……”(《传奇》)。

翟永明的写作一直就是这样一种传奇。她独赋自我识见、卓尔不群的创造力和精湛的语言技艺,三十多年以来始终置身于当代最具标志性的诗人行列。她“坚持探询沉默,为沉默赋形,同时向沉默敞开,是沉潜和飞翔、复杂和纯真的统一”。她不断调校自己的写作目标和姿态,求真务实,行稳致远,从而不断“逼近我内心所生长的一种更深刻的变化”。她着实是一个具有自我动能和运思方向的杰出诗人。

翟永明甫一登临诗坛,便以“黑夜意识”的独特神形令人瞩目,引发了女性写作群落的集体唱和及其叙述风尚。翟永明最为突显的创作特征就在于,她早期写作中实体的自我和精神的我,相对而言是混合为一体的,这使得她缺乏自我审视和自我省察。但在经历了持久的精神磨砺与个人成长之后,她逐渐挣脱了自在的自我走入自为的状态,建构了面对生活与写作的双重视域,丰富并拓展了作为诗人的思想维度,强化了自身透视、辨识和化合现实生活的叙述能力。翟永明坚持不懈的诗歌书写,由此升华为一种自觉自为的写作,显现为对于现实生存的主动承接和介入,进而清晰地确立了她在当代诗坛的方位。

除开《咖啡馆之歌》这一转折性作品,《壁虎与我》对于翟永明而言同样具有显要的标示性。“当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的目光互相吸引”,“壁虎”与“我”两者之间显然构成了一种交流与对话关系,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

“隔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各自的痛苦/你梦幻中的故乡/怎样成为我内心伤感的旷野/如今都双重映照在墙壁阴影”。

毫无疑问,《壁虎与我》使得翟永明跳脱开性别与自我,不再囿于狭隘偏仄的日常体验,而是凝练为一种直面人生命运的陈述仪

态,一种抽象化的共同经验,从而凸显出诗人无奈感喟的内心视界。

“老家是一个替身/它代替这个世界向我靠近/它拥有一条巨大的河流/河水干涸时/全世界都为它悲伤”(《老家》)

翟永明另外一个突显的创作特征,在于她从写作伊始建立的某种对事物感受认知的二元思维和对立意识,逐步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差异性的探求。这是一种极富意味的转换和嬗变。它使得诗人缓慢地退离出紧张不安的情绪,由激烈转入平缓,从痛苦走向安顺,显示出内心的平静及其与生活和解的姿态。她为自己的诗学理想不倦地垒筑企图超越自我的心灵秩序和图景。正如作者自云,她竭尽全力地投射生命去创造一个簇新的自我,并在各种叙事危机中把自己变形为一颗巨大的灵魂。

她从“我,我们偶然的形体/在黑暗中如何/在白昼也同样干枯”(《静安庄·六月》)显示的黑白对立,直到如同《闻香识舞》中“手脚乃镣铐 一个悲哀/拴住我/你我的水珠 在共同的舞中/滑落 温柔如云”一般蕴蓄并氤氲着一种清淡舒缓的细腻情绪。她处在不断地寻求语词的灵动表达的过程中,彰显和鉴证的乃是一种对于自我的体认和抽离,更是一种“从激烈宣泄到冷静感知的生存态度”。经由认知方式与话语方式的变换,翟永明透过诗思而显豁的生命体验愈加深刻、成熟、平和、圆融,使得人生独具的各种悲喜忧惧更为本真化地展露于笔端,显现在读者面前,触动人心,促人思省。她的写作是自觉而智慧的,她以试错的方式,不断地展开语言的转换和实验,企图塑造一种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格。可以说,在当代诗坛,只有翟永明最早具有性别自觉意识,让她真正回返到个体自身。同时,她又能够“以差异寻求自我,以自我彰显力量”,藉以最终回返现实的与精神的故乡,回返个体心灵的灵魂深处,回返诗歌斑斓幽邃的语言内部。这或许才是她真实祈盼的内心愿景。

忆林

忆崇安区小京班

| 刘 勇 文 |

2020年12月14日下午,崇安区原小京班《沙家浜》剧组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在梁溪区的文化生活广场中国戏码头隆重举行。

在中国戏码头三楼的大厅里,原小京班师生欢聚一堂。尽管重逢时隔近五十年,但师生相见格外激动,握手、拥抱、合影、畅谈,似乎要把积攒的话语都倾诉出来。原剧组书记,90高龄的董启发老师首先致辞,他激动地回顾了小京班的发展历史,高度肯定了这段历史对学生身心发展和品格塑形所起的积极作用。学生代表华艺和王杏宝则在致辞中表达了在学戏过程中对成长的感悟和对师恩的感激。舞台上同学们再次重温着京剧《沙家浜》“智斗”“养伤”“坚持”等戏剧片段和其他小节目,体会着当年表演的感受,会场里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笑。

说起小京班《沙家浜》剧组,它成立于1970年,由于演员都是从区内各个小学选拔抽调集中培训的,年龄只有11、12岁,所以人称“小京班”(小孩子表演京剧的班子)。剧组几经搬迁,最后定址于崇武小学(现已拆除)内。

小京班《沙家浜》剧组从奉命组建到完成使命,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在这三年时间里,剧组的师生先后在工厂、部队、农村、社区演出了一百多场次,期间还多次完成接待外国元首、国际友人、港澳同胞、华侨的演出任务。孩子们在舞台表演时的唱念做打懵懂可爱,一颦一笑稚气老成,常常逗得观众喜笑颜开,深受

人民群众喜爱。在那个岁月里,小京班的演出,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贫瘠的文化生活。

对小京班剧组的师生而言,这三年的剧组生活给他们的人生经历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尤其是孩子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和家庭疼爱 and 呵护,集中住校学习、训练,开始自我管理 and 独立生活。缺少训练场馆,他们就在水泥地上训练、翻筋斗,常常摔得鼻青脸肿、皮破血流。三九寒冬穿着单薄的戏服在露天舞台演出,冻得瑟瑟发抖;酷暑盛夏在密不透风礼堂顶着高瓦数灯光炙烤登台,热得汗流浹背……同学们都咬牙挺过来了。艰苦的剧组生涯,培养了同学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乐观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和品质,也铸就了同学们的初心和灵魂。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始终激励着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工作。从剧组走出来的同学中,有人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有人成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家,有的成为企业领导人,更多的人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年能在小京班《沙家浜》剧组学习和熏陶,是我们的幸运,因为这段经历让我们终身受益!

伴随着《难忘今宵》的音乐响起,庆典也达到了高潮。师生共同放歌,执手相拥,泪眼凝噎,说不完的相思怀念,道不尽的师生情谊。大家互道珍重,合影留念,约定下次再见。